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苗族调查报告

[日] 鸟居龙藏 著
国立编译馆 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族调查报告 / (日) 鸟居龙藏著; 国立编译馆译.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 5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
ISBN 978-7-81126-142-4
I. 苗… II. ①鸟…②国… III. 苗族—调查报告—中国
IV. K2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282号

苗族调查报告

(日) 鸟居龙藏 著 国立编译馆 译

策 划: 张三白

责任编辑: 立 道

出 版:  贵州大学出版社
发 行:  贵阳文讯书店
设计制作:  贵阳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62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26-142-4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瓠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2013年，贵州将迎来建省600年。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教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用六年的时间，以每年一个专辑十本的速度，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60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08年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其主题是苗学。因为苗族是贵州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也是有史可稽的与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多民族中的一员。为完整地体现贵州苗学的不同阶段最重要成果，我们有选择地重印了部分名著，翻译了国外研究苗族的部分重要著作，也采用了我国学者的部分优秀苗学研究的新作。

出版前言

苗族，就其人口数量言，是中国第五大民族，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苗族有 894 万人。苗族同时又是一个分布世界的民族：在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有 200 多万人，美国有 30 万人，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共有 5 万人。苗族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距今五六千年前，苗族先祖蚩尤就同华夏族领袖黄帝、炎帝逐鹿中原并称为中华文明三祖。千百年来，苗族因战乱所迫，迁徙无恒，最终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才找到生存之地。现今贵州的苗族有 400 多万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贵州是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苗族也是贵州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民族。

研究苗族和苗族文化的学问叫“苗学”，古代贵州的“苗学”文字，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员，如李宗昉的《黔记》、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田雯的《黔书》、胡宗绪的《苗疆记事》、龚柴的《苗民考》、贝青乔的《苗俗记》、徐家千的《苗疆闻见录》等。最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有清代组织的《百苗图》编绘。但上述著述大多立场偏颇，观念“正统”，又只是为“王政”或“战事”服务，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学（-ology）”。

运用现代学科方法而发轫的“贵州苗学”著作，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早期人类学家，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萨维那所著的

《苗族史》，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大量的调查报告，还有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这些著作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最后十几年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贵州苗学”形成的初期阶段。换句话说，“贵州苗学”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贵州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之后出现的《贵州苗族考》（1929，杨万选著）可以看作是贵州苗学研究初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因为抗日战争，大批大学教授和学者内迁贵州，从而促成贵州苗学研究的高潮。这一期间，贵州苗学研究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水平学者带领下的有组织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活动；二是苗族群体中出现的学者提供了“自述”的视角与研究。当年，闻一多等名教授带领的西南联大学生在贵州境内的采风；大夏大学成立了由名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徽等领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了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方面的专门刊物：《大夏大学民族学论文集》、《苗夷研究丛刊》，出版发行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新谣》、《贵州苗族概论》等著作。这一时期，苗族学者已初露锋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聚五氏，其著有《苗夷民族发展史》；若杨汉先氏，则著有《大花苗迁入乌撒考》等；王建明氏，撰有《西南苗民的社会形态》等文；王建光氏，撰有《苗民的文字》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至60年代，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教育院校。我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也为配合民族自治、民族识别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为贵州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期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编印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苗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的地方也编写了相关概况。大量调查中的“采风”作品也都收入《民间文学资料》得以编印流通。这一阶段，贵州苗学研究最大特色是“政府行为”——由政府组织得以实施。

“文革”期间，贵州苗学研究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一样，沦为空白。

虽然，此期仍不乏罕见成果，如台江农民王安江为搜集苗族古歌的艰苦努力——他从1968年开始，行乞为命，周游各地，徒步跋涉数万里，收集整理了完整的《苗族古歌》，至今仍然是值得为之赞叹的壮举。

改革开放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文革”造成的十年空白之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重建取得了丰硕成果，贵州苗学研究也成果斐然。这期间，主要的苗学研究著作有：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杨庭硕的《百苗图研究》，翁家烈的《苗族文化论》，麻勇斌的《神性妇女研究》，杨培德的《鼓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罗庭华、余岛的《贵州苗族文化教育研究》，徐新建的《苗疆考察记》，石朝江的《中国苗学》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来自苗族内外，也来自海内外。相关的涉及苗族的研究，在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的各种视角下，更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势头，苗学研究进入到“整合”阶段，有了大部头的《苗族通史》的面世，《20世纪苗学研究百部文库》首次出版第一辑便有10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也由英、苗、汉学者共同完成；首部集可视、可听、可读的《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也由本社出版。贵州苗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本丛书第一辑将目光集中在过去百余年来贵州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努力保留各个时期的阶段性代表作品。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重要著作之一，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一直未能译成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找出原书并组织了翻译；曾被称为“苗族救星”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写过《苗族纪实》，另一英国传教士克拉克著有《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此二书现合并刊行；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在1936年曾经刊行，作为早期苗学开拓阶段的代表作品此次亦作再版。

19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末，是苗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

此期间我国重要民族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选了杨万选著的《贵州苗族考》（1929）与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人的文章合为一册；苗族学者梁聚五著的《苗夷民族发展史》则更名为《苗族发展史》独立成册。

50年代至60年代，因贵州民族出版社曾出有大量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我们仅选载了著名学者费孝通“劳动的苗家”与中央民族调查团的一份调查报告和调查资料合为一册，用以反映当时的调查观点和调查方法。

80至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苗学研究恢复发展的时期。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和石朝江的《中国苗学》，也是此时期成果丰硕的苗学研究的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苗学研究日趋繁荣。考虑到苗学研究的这一现状，我们选择了美国学者路易莎和台湾学者简美玲的新著，以期读者能够了解海外贵州苗学研究的趋势和前列学者的成果。

区区十册，难免挂一漏万，还望贵州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原宥。作为贵州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部分和成果最多的部分，“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刊行的是“苗学研究”的部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贵州苗学研究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认识水平，除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作了删改外，尽可能保留原著原貌。另外，有些文章的著作权人一时未能联系上，为其大作早日出版，泽惠学林，不得已只好先行采用。我们恳请原作者或著作权继承者海涵原谅，并请与本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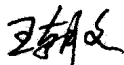
出版者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苗学部分》

序

贵州是苗族聚居的大本营，贵州也应该是苗族研究的大本营。18世纪下半叶以来，贵州苗学从“潜流”（未有苗学研究之名但已有苗学研究的著作）变为“洪流”（20世纪80年代为“苗学”立名并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也与“藏学”一样正在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显学”。不管怎么说，贵州苗学从来就是贵州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

贵州有许多优秀的苗族学者和苗学研究著作，也有许多优秀的国际学者研究贵州苗学。这是贵州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贵州文化建设的一笔重要财富。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苗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贵州苗学重要著作的集成放在其向贵州建省600周年献礼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第一辑出版，感到可喜可贺。出版社同志嘱我作序，千言万语无从下笔，写下几句感言，是为序。



（原贵州省省长、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苗族）



鸟居龙藏 博士

按：鸟居龙藏（1870—1953），著名日本人类学家。1905年到中国西南地区对苗族、瑶族、彝族进行调查。《苗族调查报告》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苗族调查报告》是专业意义上的第一部苗学专著，对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曾于1936年由国立编译馆翻译并出版，本次依据该版本进行了从新编排录入。

译序

日人鸟居龙藏氏于1902年旅行我西南各省，实地调查苗族生活。翌年归国，以其观察所得，征以古今中西图籍，著成《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共分十章，其第一章为旅行日记，译时删去，现存九章。盖皆有关苗族语言、体格、风俗、文化之记述。近年以来，政府方从事于筹边固圉，对于边徼民族，冀欲在其生活及文化方面，加以改善，是则本书之译，或于国家民族有所裨益也。原书征引中西图书，多有讹误脱略之处，其易查核者，业已修正，然而待考之处，尚不少焉。又本馆同人，各有专责，仅以余力从事翻译，疏误之处，在所难免，倘荷海内贤达，随时指教，无任欣幸。分任译事者，为张晓柳、曾广证、陈绶荪、李貽燕、何健民五君，校订者为康清桂、郑鹤声、李稼年三君。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刘英士

血统纯粹之汉族自以为五千年前来自昆仑，沿黄河长江之源而入中国西北之陕西省，于此处遇一野蛮民族，即僮僮及苗子，而征服之或放逐之，然后沿河流而进，遂至海滨之沃壤。汉族之信史约起于纪元前三五零年。

三苗住居果在今之何地？其生活状态如何？彼等之体质与言语又如何？吾人从未有充分之知识，则谓三苗之在人类学上的性质尚在黑暗界中亦无不可。A. Hosie 氏在其所著 *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1897) 一书中之记载，亦颇堪考究也。

吾人对于中国西南部非汉族之人种，知识缺乏，故欲以科学方法为精确之分类，极感困难。然而二族确有明显之区别，为旅行家所不能不注意者。汉族与僮僮非常不同，故二族同种之观念，不能一刻存于旅行者之胸中。

贵州之苗子与云南之掸族亦然，苗子、掸族及僮僮实为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之三大特殊人种。关于此等人种，吾人所知有限，因外国人未曾久居其地，盖欲知彼等之人种学的特征，非久居其地不可也。

此事亦不足怪，因此等人种所居之地远在荒徼，外国人得至其地之机会甚为稀少，即有此等机会者，亦忙于他事，无暇研究人种学之详情或学习一种新语言。

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考据上列记事，可以推知当时三苗之情形。当时三苗实居中国何地，在学术上虽不能举出确证，但在若干文献史上，亦可略知其一二，第缺乏完备之材料耳。《战国策·魏武侯》条：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霸王之业，不从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不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史记·五帝本纪》中帝尧条曰：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

《史记》注附记曰：

马融曰：三苗国名也。《正义》曰：《左传》云，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孔安国云：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饗饗也。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按：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地也。淮读曰汇，音胡罪反，今彭蠡湖也，本属荆州。《尚书》云，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是也。

据此，则当时三苗之居地，当为今湖南省之岳州，湖北省之武昌，江西省之九江之间。此等记载，果系事实，则汉族与苗族接触之场所不难推测矣。美国人类学者 D. G. Brinton 氏在其所著 *Races and Peoples* (1890) 一书中关于此事曾有记载，与余之主张相同：